

王家声等◆主编

文人的骨气和底气



梁启超
鲁迅



晏阳初



蔡元培 陈独秀 熊希龄 陈序经 马寅初

司徒雷登

潘光旦 张竞生 梁漱溟 罗翼群



蒋梦麟

叶恭绰



张东荪 张澜 闻一多

司徒雷登
胡绳



钱学森

容庚 胡先骕 冰心



罗隆基



邵飘萍



叶恭绰

世界出版



王家声等◆主编

文人的骨气和底气

W A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人的骨气和底气 / 王家声等主编. —北京: 世界知识出版社, 2011.6

ISBN 978-7-5012-4048-7

I. ①文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文化—名人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民国 IV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43059号

责任编辑
责任出版
责任校对

胡孝文 张 萱
刘 喆
马莉娜

书 名

文人的骨气和底气
Wenren De Guqi He Diqi

作 者

王家声等 主编

出版发行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地址邮编

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(100010)

网 址

www.wap1934.com

印 刷

世界知识印刷厂

经 销

新华书店

开本印张

980 × 680毫米 1/16 15印张

字 数

200千字

版次印次

2011年6月第一版 2011年6月第一次印刷

标准书号

ISBN 978-7-5012-4048-7

定 价

2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人间已无梁任公 王开林 1

梁启超的定则是爱国之心、立宪之志和新民之道，在此定则之下，其见解、行动则是不断流变的，维新——保皇——君主立宪——护法——民主共和，仿佛三级跳远，助跑之后，他就必然会有一连串的腾挪。现代作家郑振铎在《梁任公先生》一文中对梁启超的多变表示了深深地理解：“他之所以‘屡变’者，无不有他的最坚固的理由，最透彻的见解，最不得已的苦衷……他的最伟大处，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，便是他的‘善变’，他的‘屡变’。”

蔡元培：是真虎乃有风 王开林 13

蔡元培一生的座右铭为“学不厌，教不倦”。他三度旅欧，精研西方哲学，在巴黎访晤过居里夫人，在德国访晤过爱因斯坦，两次高峰对话使他受益良多。嗣后，他提出“以美育代宗教”的主张，乃是积学深思所致，绝非异想天开。终其一生，蔡元培对学问抱持浓厚的兴趣，对教育怀有炽热的感情，虽历经世乱，屡遭挫折，却不曾泄气灰心。

蔡元培为何七辞北大校长职务

傅国涌 29

蔡元培是真正的学界泰斗，受到举世景仰是名至实归，鲁迅始终尊敬这位同乡前辈。从51岁出任北大校长到61岁最后卸任，蔡元培在任一共10年，但实际上在校时间不足5年，期间他曾七辞北大校长而不准。我们先看看这张辞职表：

第一次辞北大校长职1917年7月3日；第二次辞北大校长职1918年5月21日；第三次辞北大校长职1919年5月8日；第四次辞北大校长职1919年12月31日；第五次辞北大校长职1922年10月19日；第六次辞北大校长职1923年1月17日；第七次辞北大校长职1926年7月8日。

陈独秀：龙性岂易驯

王开林 40

陈独秀对国民党素无好感，共产国际要中共集体加入国民党，他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，认为这种做法无异于“在粪缸中洗澡”，只会沾上一身污秽。他曾创作《国民党四圣经》，彻底剥掉了国民党的党皮：

党外无党，帝王思想；党内无派，千奇百怪。

以党治国，放屁胡说；党化教育，专制余毒。

三民主义，胡说道地；五权宪法，夹七夹八。

建国大纲，官样文章；清党反共，革命送终。

军政时期，官僚运气；宪政时期，遥遥无期。

忠实党员，只要洋钱；恭读遗嘱，阿弥陀佛。

熊希龄：“此君一出天下暖”

黄 波 55

新科举人于府衙赏花，吟诗作画，有画牡丹者，有画荷者，有画菊者，熊希龄则画了一株棉花。画史

上何曾见过以棉花入画？他不动声色，在留白处题写了“此君一出天下暖”七个字——熊借棉花言志，震动全场。

陈序经最后二十年的浮沉

张晓唯 63

陈序经一向以“敢言”、“好辩”闻于世，颇有所谓“一士谔谔”之概。可是在1957年“鸣放”时，他却显得比较谨慎，发言很迟，那篇发言记录稿《我的几点意见》6月间发表在《南方日报》时，与“事情正在起变化”的事态转折已非常接近了。他的发言温和含蓄，但不失锋芒。其中谈到：高校内泛政治化现象严重，学术与政治不分；一些党员用搞政治运动的经验，硬套到高等教育上；一些党员做事往往不讲法律和制度；一些干部与其说是违法乱纪，不如说是无法无纪。他在发言中强调，高校如果不要党的领导，是很难想象的，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党的领导，而在于如何领导。曾有报纸点名批评这个发言，而陈序经在反右运动中竟安然无事。据知情者透露，陈乃“内控右派”。由此或可推断：中共高层在对陈序经的使用问题上存有分歧，而对其肯定者居于上风。

马寅初：“敢言敢怒见精神”

魏邦良 75

马寅初很喜欢杜鹃花，他对朋友说：“人们都只见这花的颜色，而我却看到了它的魂魄，它的精神。你知道，它为什么能有这般的殷红吗？那是它们从心头里流出来的赤血。唯有这赤血，才叫人醒心醒目。”

“不屈不淫征气性，敢言敢怒见精神”，新华日报社送马寅初六十大寿的这幅贺联，也是他一生傲岸不屈、挥斥方道的真实写照。

马寅初与蒋梦麟：同学不“同途” 张耀杰 86

北大校长蒋梦麟的“北大之精神”是“循思想自由原则，取兼容并包主义”，所以有了他此后提倡的“节育运动”；北大校长马寅初的“北大之精神”是“服务于国家社会，不顾一己之私利”，所以有了他此后提倡的政府强制“控制人口”——对比两人几十年前的思想、行为，不禁令人深长思之。

鲁迅为何拒绝诺奖提名 傅国涌 90

诺贝尔赏金，梁启超自然不配，我也不配，要拿这钱，还欠努力。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，他们得不到。你看我译的那本《小约翰》，我哪里做得出来，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。

或者我所便宜的，是我是中国人，靠着这“中国”两个字罢，那么，与陈焕章在美国做《孔门理财学》而得博士无异了，自己也觉得好笑。

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，瑞典最好是不受理我们，谁也不给。倘因为黄色脸皮人，格外优待从宽，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，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，结果将很坏。

还记得晏阳初吗？ 晏鸿国 97

早在1933年，埃德加·斯诺参观定县后写道：“他是一位有才干的学者，一个有独创的教育家……他领导的运动一旦成为革命的强大运动，势必超过中国军人多年来打来打去的放荡行动。”

1941年罗斯福曾发表文章提出了著名的“四大自由”。晏阳初却在此基础上补充了“第五种自由”：

人民要有“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”。

1989年美国总统布什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辞中说：“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，而不是施舍，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。”晏阳初，这位中国人民的儿子，早已成为世界公民。

1990年，一代“平民教育之父”于纽约寓所辞世。人们将记得他曾这样说：“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，但其确切含义是什么？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？是黄金还是钢铁？都不是，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！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，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。”

1925：“歧路”上的胡适

邵建 104

胡适在思想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，而在政治上，却是一个保守主义者。看起来，这是一种精神分裂，但其实是一种社会观上更为复杂的多元主义。一味地改良，或者一味地革命，有时不免陷于简单。如果说，胡适的改良在文学上被陈独秀裹挟了去，那么，在社会政治领域，陈独秀不断希望胡适再进一步、再进一步，但胡适已经无以前进了。他最终没能越过“革命”这道铁门限，不仅与陈独秀分道扬镳，而且还注定要成为“革命”作为世界潮流的那个时代的落伍者。

“性博士”张竞生

王开林 113

常人与学问家，根本上不大相同。常人不肯说，不肯研究，只要暗中去偷偷摸摸。学问家则一视同仁……无论哪种学问，都可研究。而最切要的，又在研究常人所不敢，或不能研究的问题。

“我若死，天地将为之变色”

——梁漱溟“狂妄”话语的背后 魏邦良 122

“‘为往圣继绝学，为来世开太平’，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。《人心与人生》等三本书要写成，我乃可以死得；现在则不能死。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，亦正需要我；我不能死。我若死，天地将为之变色，历史将为之改辙，那是不可想象的，万不会有事！”

罗翼群与叶恭绰 散 木 127

叶恭绰此前“被错划为‘右派分子’”，已停止了全国政协常委和代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的职务，直到1959年“摘帽”。让人产生兴趣的是：叶在这次家宴上会有什么话要说呢？或者毛泽东会对他说些什么话呢？这些，我们全都不知道。只知那天席间，叶恭绰为毛泽东七十诞辰撰写了一首长诗，从领袖的文治武功到畅游长江，当然是出口成章的。据吴开斌回忆，这一首长诗，罗翼群阅后，称“乃圣乃贤，乃文乃武”。据张中行的《负暄琐话》：叶恭绰其人，“最大的特点是有才；才的附带物是不甘寂寞；稀有的经历深深地印在言谈举止中，具体说是，文气古气之中还带有时多时少的官气”。

话说张东荪 蓝英年 139

张东荪在燕大礼堂作了著名的《老鼠与花瓶》的演讲：“北平是个花瓶，傅作义是瓶子里的老鼠。老鼠是可恶的，人人都想消灭它，但它却躲在一个精美的花瓶中；既要消灭老鼠，又要不打碎花瓶，就不得不

采用和平方式，用和谈的办法解决。”朋友们纷纷写诗赞扬张东荪的功绩，他把这些诗以《围城题记》为标题，亲手抄录下来，并写了后记，准备留给子孙。他写道：“戊子冬，北平围城。余与刘厚同、赵少伯、彭岳渔、张丛碧倡议罢兵，以保全人民古物。以余为双方信任，使出城接洽。当时虑或不成，栗栗为惧，乃幸而一言得解。事后友人义之，有此题咏颂。余亦自谓生平著书十余种，实不抵此一行也。因装成幅，留示子孙。东荪自识。”

“长袍先生”张澜

智效民 150

在传统文化中，“衣冠服饰”具有特殊的意义。它不仅是社会形态与正统地位的标志，也包含着人们对现实的态度与角色的认同。正因为如此，清兵入关后实行严厉的“易服剃发”政策。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，中山装和列宁服立刻成为一种社会时尚。据说在开国大典前夕，周恩来曾拨出专款让张澜置办服装，张以不愿耗费公帑而谢绝这笔款项。于是，在开国大典上，张澜贵为国家副主席，但依然是布衣长袍，给人一种不阿世、不媚俗的深刻印象。

除此之外，张澜之所以身着长袍，恐怕还有另外一层意思。

自古以来，搞政治的人都离不开军队。但是以张澜为首的中国民主同盟，却是一个以文人为主体、以“从不沾手军队”为宗旨的政治组织。再加上旧时文人习惯于穿长袍，因此张澜及其同人被称为“长袍先生”。

闻一多、潘光旦、罗隆基轶事 李 凌 157

闻一多生性刚烈，疾恶如仇，对一些人和事，认为不正确的，即使最熟悉的朋友，也不留情面，此次批评罗隆基即为一例。好在历史风云际会，闻、罗二人于抗战期间同在西南联大任教，共同参加爱国民主运动，批判国民党一党专政，在许多问题上取得共识。闻一多于1944年参加民主同盟，介绍人之一就是罗隆基，另一人是吴晗。

新闻报国：邵飘萍的不归路 傅国涌 164

德柏总结了飘萍的“办报宗旨”，所谓“无钱不要，无人不敲”；其“作风”则是“先骂，得了钱后即百八十度转变，而大大恭维”。例如，1924年，中苏进行复交谈判，其时，外交总长为顾维钧，负责谈判的是王正廷。王氏谈妥，并草签合约，向顾氏报告，孰料顾氏不同意（彼时他对苏联的看法与张作霖相似），打回重写，而又不下达更具操作性的指示，于是，谈判一度陷入僵局。飘萍乃撰文大骂顾维钧，轰动朝野。顾氏脸皮薄，当即赠金5000元，并承诺增加外交部对《京报》的津贴。第二天，飘萍再写一篇社论，则大捧顾维钧，痛骂王正廷。

浙大：“书傻子”校长竺可桢 傅国涌 179

自称“书傻子”、不屑也不善搞中国式人际关系的科学家竺可桢为何能将浙大办成“东方之剑桥”？

北大老校长周培源说：我们过去全盘学苏联，但对浙大这样的我们自己的好传统好经验却没有很好学习继承。同济老校长李国豪说：“我们办大学，要学习

竺可桢办浙大那样。”

一个完整的司徒雷登

秦 海 188

1939年，司徒雷登在一次对全校师生的讲话中说：“燕京大学不是‘世外桃源’，不能‘两耳不闻窗外事’，而是要关心国家大事”，“现在的燕京大学处在沦陷区，不要被日寇的反面宣传所迷惑”。日本人曾提出让日本学生进燕大读书的要求，司徒雷登表面同意，但坚持应和中国学生一样经考试合格方能录取，结果虽有日本学生报考，却因未达到标准，无一人进入燕大。

有关钱学森的假故事

叶永烈 199

钱学森从来没有“厌恶地吐了一口唾沫”之类的动作。钱学森出身“华丽家族”，受过高等教育，言谈举止非常文雅，哪有“吐了一口唾沫”之类的习惯？据炊事员回忆，即便是在大热天，钱学森在家中餐厅吃饭时，总是穿得整整齐齐，绝对不会穿背心、短裤出现在炊事员面前，以示对炊事员的尊重。

老圃秋容淡——实话实说的容庚

黄天骥 211

实话实说，是容老性格一大特点。我们问他，为什么他能辨认出那么多的天书一样的古文字？他随口回答：“靠猜。”我们不禁愕然。那时，学术界都在批判胡适“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”的治学方法，我们以为容老是在开玩笑哩！谁知他一本正经地解释：“我对着这些字，比较来比较去，印证一番，就猜中了。”容老不是理论家，不说大套道理，他所说的“猜”，是以深厚的学识为基础的，必须掌握充分的材料，经

过缜密论证，才能解开那些千古之谜。

不该如此寂寞的胡先骕

贺伟 218

1948年底，国内战争已快见分晓，许多知识分子对时局感到困惑、迷茫，对个人安危和前途深感忧虑。此时，在北平复任静生调查所所长的胡先骕却积极参与组建社会党，并亲自起草社会党的政治纲领《中国的出路》，其中有这样的话：“第一，如果我们不参与政治，别人将要把与我们的意志和良心相反的制度，强加到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身上；第二，人类的进步理想，不仅是经济生活的安全，更需要心灵的平安与知识的自由……第四，我们应当以宪政的方式，加紧步骤，实现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。”胡先骕的这些观点包含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的深切期望。

冰心净言 一片冰心

邵燕祥 225

冰心老人的性格是温柔敦厚的类型，与她接触得多的朋友，都有如坐春风之感。但这不排除老人有时也会出语凌厉。比如面对日益严重的腐败、特权等现象，冰心曾对在座的中共党员说：“你们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也该有一个‘革命委员会’呀？”这里说的不是“文革”中作为各级政权机构的“革（命）委（员）会”，而是民主党派之一的“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”的那个“革命委员会”。她这是一句玩笑话，又不仅是一句玩笑话，这是以玩笑话形式说出的一句净言，是共产党的净友才说得出的肺腑之言。推其本意，不过是说党必须面对自己的痼疾，痛下针砭，该吃药的吃药，该开刀的开刀，只有经过自身的改革，才能保持真正的改革的领导权，才能真正把改革进行到底。

人间已无梁任公

王开林

1873年，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。小时候，梁启超常于静夜躺在卧榻上听祖父娓娓讲述古代豪杰、忠臣、志士、哲人的嘉言懿行，其中印象最深的便是“宋末三杰”之一的陆秀夫身背幼帝赵昺在厓山跳海殉国的悲壮史事。厓山位于新会县南部，离茶坑村不远，梁启超多次到过那里的三忠祠。“海水有门分上下，江山无界限华夷。”前人这两句诗铭刻在他的心中。

科举路上的顺与不顺

梁家名为耕读之家，田产却并不多，仅够糊口而已。梁启超父亲梁莲涧是一位不甘心受穷的穷秀才，他曾专程跑到日本，向梁启超索款购置产业。梁启超当时经济拮据，无法应付，梁莲涧便以自杀相要挟，最终由梁启超的弟子们解囊相助，集资1200块银元，让梁莲涧欢天喜地满载而归。梁启超平生不爱置田产，他曾开玩笑说：“假若十块钱买一亩田，或十块钱买一只鸡，我宁愿吃鸡不买田。”可见他根本瞧不起那些一门心思买田修屋的土财主。

梁启超才华早秀，堪称神童。对对子，人出上联“东篱客赏陶潜菊”，他脱口即能对出“南国入思召伯棠”；吟诗、写八股文，同样不在话下。别人在科举路上跌跌撞撞，梁启超却走得很顺，13



梁启超像

岁成秀才，17岁成举人，只是在会试时莫名其妙地栽了个大跟头。据胡思敬《国闻备乘》所记：主持乙未（1895年）科会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徐桐，副主考则为启秀、李文田、唐景崇三人。“文田得启超卷，不知谁何，欲拔之而额已满。乃邀景崇共诣桐，求以公额处之。”也就是说，还有一些机动名额由徐桐灵活掌握，拨一个给李文田，即可成全梁启超。徐桐是个老顽固，不喜欢梁启超的卷稿牵引古义，越出绳尺，硬是不肯拨给名额。他还对李文田袒庇粤省同乡颇有微词。李文田无奈，只好将梁卷“抑而不录”，并在卷末批曰：“还君明珠双泪垂，恨不相逢未嫁时。”表明其惜才而又无奈的心情。此后，梁启超便绝迹科场，他做《时务报》主笔时，更是痛斥科举制度扼杀人才。

梁启超：六大矛盾的集合体

梁启超为人率真、热忱，全无城府，一团孩子气。他自称为“中国之新民”和“少年中国之少年”，识者皆认可，不觉其矫情。

当初，他以举人之身拜监生康有为为师，如此见贤思齐，不虚心绝对做不到。最难得的是，梁启超精力弥漫，至死不衰。从外貌看，他短小精悍，秃顶宽下巴，目光如电，喜欢穿长袍，步履稳健，风神潇洒。他三十余岁办《新民丛报》，志在开言路、通舆情、启民智，其文章气势凌厉、感情充沛，影响了一代青年。

身处大动荡、大混乱、大嬗变的时代，梁启超的“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，随感情而发，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”。比如说，他所主张的“做人的方法——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”和“做学问的方法——在学术界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”，二者之间潜藏着难以调和的矛盾。他要逃避或解决这些矛盾，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善变，“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”，这是他最令人敬佩的地方（从善如流），也是他最令人诟病的地方（立足不稳），康有为即曾呵斥这位大弟子“流质易变”。梁启超一生所遭遇的全部荣辱、毁誉、成败、得失，莫不根源于一个“变”字。作为近、现代政界、文坛和杏坛最具争议性的巨擘，梁启超在生活上、政治上、学问上存在六大矛盾，他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，其通体附丽着异常驳杂的色彩，就像一个大大的调色盘。

矛盾之一：作为“一夫一妻世界会”的发起人， 却明里蓄妾

任公17岁中举，深得正主考李端棻和副主考王仁堪的赏识，赞为国士无双，许为大器。李端棻觉得做房师不过瘾，他宁愿自降一级辈分，去做梁启超的内兄，结下这门亲戚。他请王仁堪执柯作伐，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。李蕙仙比梁启超大几岁，贵小姐下嫁穷书生，她能处丰，亦能处约，持家有方，只是阃威太严，任公敬她让她，也有些怕她，惧内之名一度与胡适相埒。冯自由在《革命逸史》中有一节专门写到《梁任公之情史》，认定梁启超的

婚姻并不美满：“李女貌陋而嗜嚼槟榔。启超翩翩少年，风流自赏，对之颇怀缺憾，然恃妇兄为仕途津梁，遂亦安之。”

1899年冬，梁启超从日本乘船去美国檀香山，应华侨保皇会之邀，前往演讲，妙龄女郎何蕙珍临时充当译员。何女士是当地的小学教员，不仅身材窈窕，容颜妩媚，而且具有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才华智识。彼此交往之后，梁启超为之倾倒，于是梁郎赠小像，何女馈小扇，两情暗洽。然而待到梁启超露出求婚之意，何蕙珍却以任公使君有妇，文明国不许重婚为由，婉言拒绝。任公情怀缱绻，难以自持，于是舒吐为诗，共计20首，发表在《清议报》上。何蕙珍性情刚烈，不肯屈为姬妾，这是一场无望的情事，梁启超怕遭物议，只好撒手。好在他另有想头，回到夫人李蕙仙身边，还有一位陪房丫头王桂荃侍候他，聊慰其落寞情怀。李蕙仙为他生思顺、思成、思庄一男二女，王桂荃则为他生思永、思忠、思达、思懿、思宁、思礼四男二女，梁家人丁兴旺，倚赖王氏为多。

梁启超是“一夫一妻世界会”的发起人，到头来，却改变初衷，安享齐人之福。他颇能取巧，妻只一人，妾可忽略不计，如此一来就算是遵守游戏规则了。这一矛盾显然暴露出他感情丰富、意志薄弱的一面。他曾振振有词，自称“风云气多，儿女情少”，实在难以服众。

矛盾之二：提倡科学精神，却又喜欢谈玄扶乩

当年，严复翻译《天演论》，梁启超为之润饰十分之六七，但他的兴趣是散漫的，除了玩味佛老之学，他还一度对扶乩这样的迷信课目颇为上瘾。乙未（1895年）晋京前，梁启超与同门师兄弟扶乩问休咎，乩仙下凡，在沙盘上出示律诗二首，其一为：

蛾眉谣诼古来悲，雁殡衡沙远别离。三字冤沉名士狱，千秋泪